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学术著作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 城市发展变迁研究

主 编 ● 何一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学术著作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 城市发展变迁研究

主 编 ● 何一民

作 者：何一民 艾智科 王肇磊
丁小珊 李映涛 等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 / 何一民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12

(大后方丛书)

ISBN 978-7-229-09837-7

I. 抗… II. 何… III. 城市史—西南地区—1937~1945
IV. ①K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0622 号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

KANGZHAN SHIQI XINAN DAHOUFANG CHENGSHI FAZHAN BIANQIAN YANJIU

何一民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徐 飞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陈 永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40mm×1030mm 1/16 印张: 49.25 字数: 774 千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837-7

定价: 9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 主 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 振 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 川 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 建 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 德 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 斯 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 贵 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 庭 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 重 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 金 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钺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贤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本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笙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心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宗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宏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 畏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曾维伦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会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

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序 言

何一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受到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城市亦不例外。随着战事的逐步扩大,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城市相继沦陷,中国政府和东中部的企业、机关、学校等都面临着向大后方进行战略转移的任务。特别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以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新疆等省组成的大后方成为了全国抗战的坚实堡垒,大后方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以此为契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城市发展迈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也正是由于大后方城市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构筑了抗击日本侵略的不垮长城。因此,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进行系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非常必要。

首先,通过探讨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为抵御外来侵略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一场包括各地区、各党派、各阶级在内的全民族的反法西斯战争,它既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也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为了赢得民族解放,整个国家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其中,大后方城市的发展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全民族组织抗战的重要载体和基地。

其次,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的发展,有助于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变迁。抗战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化较为特殊的一个阶段。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发展重心,一方面,东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被迫中断;另一方面,

中国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晚清开始一经启动就如开了闸门的江水,一往直前,不可遏制,因而当东中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受到战争的阻碍后,中东部地区的大量人口、工厂、企业、学校以及其他机构向大后方城市的转移,直接加快了大后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轨迹,可以说,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城市发展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延续。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的发展为20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城市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影响深远。从这个角度上讲,抗日战争不仅仅具有民族解放的意义,它还是中国的一次现代化进程的调适过程,促进了大后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这种调适尽管具有很强的被动性,但对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后方在战后的发展也奠定了基础。

另外,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就城市史研究而言,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做深入研究,是学科发展的趋势。鉴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和地区性变异幅度很大的客观国情,开展宏观的、整体的城市史研究的同时,将中国按空间分解为若干个较小的研究单位,进而对其中各要素作细微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因而加强抗战时期大后方研究还具有学科建设的意义。

2011年初,通过重庆相关方面知悉重庆市正在组织全国专家学者就抗战史展开全方位的研究,该大型研究工程是开放式的,面向国内所有的研究者,其中有关于“抗战时期重庆与四川城市发展”研究方面的选题,具体事宜是由重庆市委宣传部负责。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对此信息高度重视,当即召开会议商议,决定申报该课题。经过相关程序,该课题得到批准,并以我为课题负责人。按重庆市委宣传部下达的研究任务,只是研究抗战时期重庆和四川的城市。但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将大后方所有区域的城市都纳入研究的范围,不仅有川、渝、云、贵等西南地区,还包括陕、甘等西北地区,以及西藏和新疆。但是,研究进程的开展并不能完全如愿,一是经过半年多的资料收集,发现收集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城市的资料有相当大的难度;二是原承担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城市研究的同志突然失联,在近一年的时间内都无法联系,后来才知是身体出现状况;三是仅西南地区城市的资料就非常多,写出来的体量就很大,如果再加上西北地区,可能会上百万字,远超出重庆市委宣传部的要求。另

外,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正在将西藏和新疆城市作为专项课题开展研究,因而在此情况之下,才决定将原定大后方城市研究改为西南大后方城市研究。“西南一词照狭义解释,乃指川、康、滇、黔而言。一般论西南建设者多侧重于前三省之阐述,而对黔省之建设问题,每多废而不言,言之,亦不过片断之论述耳。”^①但是今天我们研究西南大后方的城市是要包括重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本课题主要分为五部分进行研究,一是对抗战前后中国城市的发展进行整体的、宏观的研究,鸟瞰抗战前后西南大后方城市的发展变迁;二是对战时陪都重庆的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三是对四川省(包括西康省)的城市在抗战前后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四是对云南省城市在抗战前后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五是对贵州省城市在抗战前后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历史上,西南地区多因交通不便,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因而发展相对缓慢。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因国家战略中心的转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特别是部分中心城市在多重动力机制的推动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与国内其他重要中心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同,甚至还可能超过相当部分城市,西南中心城市的发展对于西南地区其他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从纵向相比有着较大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一、城市数量增多,城市结构发生变化。据统计,四川地区(包括西康)县级城市在1936年为180个,到1945年增加到187个,增加了7个;云南则从1935年的110个增加到1945年的112个,增加2个;贵州由战前的81个增加到1940年的82个,后又调整至78个,西南县级城市共增加了6个^②。从表面上看,县级建置城市数量有所增加,数量不多。但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建置城市数量有所增加;二是建置市的数量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西南城市的空间格局;三是城市规模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部分区域中心城市兴起。

抗战时期,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区域中心城市得到了优先发展,城市

① 谢文钊:《贵州之经济建设问题》,《贵州》,1940年,创刊号。

② 付林祥、郑宝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6—77页。

用地规模、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分别成为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在这几座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下,西南城市不断由传统走向现代,促进了西南城市规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一是重庆由四川省辖市提升为院辖市,并定位为中华民国的陪都,使重庆成为西南、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城市。二是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和四川的盐业生产基地自贡相继撤县设市,进行了市制改革,加上战前设立的重庆、成都、昆明三市^①,西南地区便拥有了五座市建置城市,市建置的增设对于这些城市的推动作用十分巨大。三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后方的政区进行了调整,四川、云南、贵州共设立了30余个行政督察区,将县级城市分为1—6个等级。行政督察区的所在城市一般是发展较好和规模较大的城市,因而西南城市的城市行政等级结构便由战前的省会—行政督察区—县城(局)的三级结构,演变成为陪都—省会—行政督察区—县城(局)四级结构,而县级城市因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分为多个层次,四川县城分为六级,云南、贵州分为三级^②。

二、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出现较大发展,部分城市的质量得到提升,城市道路、桥梁、城市供水、供电、通讯等都有很大的发展。经过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努力,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西南城市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城市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1936年成都市政府拟定了成都市道路计划,重新设计了贯穿成都市全城的四条干路:东干路、南干路、西干路、北干路,至1944年,四条干路基本完工,又修筑了环城公路20余公里,并改良了市内大部分道路,“现全市684街,其未扩修者仅余偏僻最少数之街巷”^③。还修建了复兴桥等桥梁^④。现代水电事业也因外省人口和工厂的迁入而得到了较大发展。成都启明公司的发电量由1937年的280万度增加到1941年的730万度,到1947年更增至1545万度^⑤。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成都市街灯也逐渐采用电灯以取代菜油灯。1938年安装街灯752盏,计172街,至1942年全市街灯总数增加到1900余盏,除少数街

① 付林祥、郑宝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

② 付林祥、郑宝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121页。

③ 蔡永如:《成都市之路政与排水建设》,《成都市》,1945年4月,第2期。

④ 李澄波:《修建复兴桥概述》,《成都市》,1945年,第3期,第23页。

⑤ 赵星洲:《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剖析》,《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

道外,基本上主要的街道都安设了街灯。^①为保障饮水安全,1939年成都市提出筹建自来水厂,1945年8月成都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后,即着手铺设水管线路。1946年4月13日第一期工程完工,市民开始了有清洁卫生的饮用水。现代通讯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抗战初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通讯设备迁至成都、重庆等城市,成都因之形成了一个以有线电为主,无线电为辅,电报、电话并重的电讯枢纽,并和后方各省全部联络贯通^②。到1944年,成都与省内通话的县城达百余个^③。同时又因交通部将上海部国际无线电台移至成都,而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分别建立了直通伦敦、柏林、日内瓦、旧金山、马尼拉、悉尼等国际无线电路。贵阳则对城区内50余条街道、马路进行了翻修和整治。^④电力建设也成绩突出。1938年贵阳工业用电量为零,但到1945年则增至832.7万度。^⑤重庆在市政建设方面成就更是巨大,“和上海、南京等都市没有差别”,“重庆作为近代都市基础设施的要素较齐全”。^⑥除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大城市外,一些中小城市相关市政建设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如落后的贵州,到1946年已建电厂的县城有镇远、铜仁、遵义、独山、安顺、清镇、惠水、息烽、修文、贵定、兴义、普定、湄潭、桐梓14县。^⑦遵义等城市安设了公用电话。^⑧安顺县政府将儒林街、顾府街、南街、府门街、县门口、七五街、大梨街、范衙街、金柜街等街道均拓宽改建成马路。^⑨这些城市的现代邮政、电信等市政工程在抗战时期也得到初步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贵州城市现代性因素的增长。^⑩

抗战时期,西南城市因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促进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成都市自改修马路以来,街衢整洁,市政一新,物

① 成都市政府:《成都市市政统计》,1942年。

② 《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周年纪念刊,1946年4月。

③ 《成都电信局业务科长长途话务价目表》,1944年。

④ 《贵阳市政统计年鉴》,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月。

⑤ 1947年《贵州省统计年鉴》(胜利纪念特辑),第91页。

⑥ 东亚同文学会:《四川新地志》,1942年。

⑦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城乡建设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⑧ 遵义市文化局史志编写组:《遵义文化史》,遵义市文化局,1990年内部版,第224页。

⑨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城乡建设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253页。

⑩ 都匀市史志编纂委员会:《都匀市志》(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60—969页。

质文明,颇有蒸蒸日上之势。”^①甚至贵州偏僻小县城——晴隆,“一切建设已煞然大备,实为西路小县中最进步者”。“夜间,街上的商店都在煤气灯光下显得非常辉煌,市景也很可观。”^②

三、在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原来就存在的城市发展不平衡出现更大的分化和差异。一方面是少数大中城市发展非常快,另一方面则是大部分城市规模甚小,发展缓慢。西南数省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及历史发展有巨大的差异,从而造成了区域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抗战时期,由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发展动力的不平衡,导致各省发展不平衡,各省内部发展不平衡。总体而言,四川地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城市发展较快;云南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东地区城市也得到较快发展;虽然贵州和西康相对滞后,但相比抗战前,城市也有较大的发展,贵阳、遵义、康定、雅安、西昌等城市在抗战时期也迅速成长。但为数众多的边远地区的城市相对发展就较为缓慢。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发展不平衡还表现在城市工业的发展方面,1942年四川(包括重庆)建有工厂1654家,云南106家,贵州112家,西康12家,资本额分别为1130012000元(法币)、209499000元、46264000元和329800元。^③除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外,城市人口规模也有突出的表现,重庆城市人口规模最多时达百万以上,成都城市人口最多时也有70余万人,昆明、贵阳等中心城市的人口也分别有数十万人;但西南边远地区大部分城市的规模都甚小,发展仍然缓慢。据记载,贵州有部分县级城市人口在“百余户”,“三百余户”,“居千余”等,这类的记载比比皆是。^④虽然抗战时期不同类型的城市都有一定的发展变化,但仍然有些边远城市远离工业革命和现代化,仍然停留在农业时代,“是古朴的”。^⑤

四、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区域城市体系初步形成。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中心城市在多种动力的推动下出现快速发展,

① 何一民:《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页。

② 刘磊:《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8、383页。

③ 经济部统计处:《后方工业统计概况》,1945年5月。

④ 刘磊:《抗战时期黔境印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97页。

⑤ 刘磊:《抗战时期黔境印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功能不断强化,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中心的辐射力和聚集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重庆,因其陪都的政治地位,聚合了当时所有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而成为了整个大后方,甚至是全国的中心城市。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中心城市通过政治、交通、经济、文化、物流的联系,将其影响辐射至省域范围,甚至跨越行政区别,影响到整个大后方。成都在抗战时期,不仅是西南的政治中心之一^①,而且还因“与它附近地带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很密切,……如原料的供给,交通的便利,市场的接近,动力的供给,资金的周转,劳工的供给”,使成都“渐渐地从手工业姿态演进到新的工业化类型”而成为川西的工业中心^②;文化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现在已变成全国文化中心之一”^③,是“后方四五个大都市当中的一个”^④。贵阳则从一个“苗彝遍地贫瘠不堪的处所”而“形成西南诸省交通的中心枢纽”^⑤与“大都会”^⑥。

随着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中心城市功能的加强,它们也增强其腹地的辐射力和聚集力。重庆因“陪都”政治地位和位于西南门户优势,将长江上游、嘉陵江、涪江、沱江、乌江沿岸和川黔、渝黔、成渝公路等沿线的成都、宜宾、乐山、泸县、内江、江津、万县、贵阳、遵义等城市紧紧地聚合在一起,在战时发展成为西南最大的中心城市,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以成都、昆明、贵阳为次中心和各等级的县级城市等不同层级城市,共同构建的西南后方城市空间体系,从而促进了西南城市体系的变化。

此外,抗战时期西南城市发展还具有明显的突变性特征。大多数西南城市在战前发展几乎没有现代性因素,却因中东部国家机关、军队、民众以及工矿企业、文教事业的西迁,城市建设与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是为西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随着抗战的胜利,政府机关、厂矿、技术人员、各类文化工作者的离去,则使西南城市发展顿时衰落下来,呈现出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特点。

① 吴泽宣:《成都市易长之前后》,《市政研究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8年7月25日。

② 张圣轩:《成都工业现状及其发展途径》,《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4期。

③ 景怡:《成都剪影》,《宇宙风》,1940年,第105期,第250页。

④ 王楷元:《理想中的大成都》,《成都市》,1945年,第3期,第5页。

⑤ 顾君毅:《贵阳杂写》,《旅行杂志》,1939年,第3期。

⑥ 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第140页。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因国家战略的需要,在中东部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和大量人口西迁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得到了快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大后方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步改善了西南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带动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但是,由于西南地区缺乏持久有力的内生动力机制,致使西南城市因战后人口、各项现代事业和国家战略重心东移而普遍衰落,并呈现出外源性、不平衡性和突变性等发展特征。

先后参与本课题研究者达十余位,参加初稿撰写的主要有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何一民教授、重庆三峡博物馆艾智科博士、江汉大学王肇磊博士、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丁小珊博士、四川省社科院李映涛博士,另外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刘杨、黄灵、陆雨思、田月等多位硕士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城市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本课题由何一民主持,并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对全书的修改。本课题初稿于2013年初陆续完成,但对这些分散的初稿进行修改却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直到2014年中期才完成。即使如此,仍然存在若干不足和问题,只好留待后来者弥补,敬请读者批评指正。